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〇一期 ——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5d)

【研究评论】	为林彪翻案和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宋永毅
【往事非烟】	走在大潮边上	唐晓峰
【亡灵祭坛】	有感于刘素菲之死	王民权
【难忘岁月】	惊魂万里——一段长达四十年的误会	杨昂岳
【运动记愧】	我对批斗“反动军官”的悔恨	李 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研究评论】

为林彪翻案和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 宋永毅 •

◇ 文革绞肉机里榨出来的历史真相

近年以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连续推出了原文革中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邱会作和黄永胜等人的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上下册）和《军人永胜》。连同香港北星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心灵的对话》、《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等，在中共官方今天还继续掩盖文革真相的大背景下，从难得的角度、通过有分量的当事人的回忆，拉开了一角上层的黑幕，更为千万读者归还了他们早就应当有的公民知情权。值的一提的是：邱、吴、黄等人在文革中原来都是“革别人命”的最革命者，且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尊。但文革作为一个不断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无休止的绞肉机，最终把他们也吞吃了进去。这样，他们才有今天的觉悟，秉笔写下了这些历史真相。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读者似乎也应当“肯定”或“感谢”一点文革。因为没有这类“革了所有人的命”的疯狂革命，邱会作、吴法宪等人完全可能像中共的其他高级干部那样，把那些残忍血腥的内幕作为党的最高秘密带入到坟墓。

◇ 是林彪想搞“政变”，还是毛泽东准备政变？

这些作品里最有历史价值的回忆，无疑是对长期以来中共官方指责林彪要搞“武装政变”的有力否定。例如，长期以来，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提出的“设国家主席”的政见被官方视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而吴、邱两人的回忆就详细地告诉读者：其实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也前后反复，出尔反尔。倒是林彪，在一旦认识到毛泽东不想设国家主席其实是不想给他留位子后，在庐山会议上只是附和其他三位政治局常委，如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意见。但是毛泽东仍不放过，事后还是把它作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来批判。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也很少和黄吴李邱联系，更从来没有谈论过什么“政变”的具体计划。简言之，说林彪等人策划了反革命政变是莫须有的。林彪在庐山会议后的态度，不过是“不说话，不干扰，不自责”而已。然而，林彪没有想搞政变，不等于毛泽东没有开始搞政变。如同邱会作所分析的：即便没有“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之争，毛泽东也照样会找出另外的藉口来“拿掉林彪”。因为九大以后，毛泽东对林彪所代表的军人集团在党内的迅速坐大就已经心存狐疑，准备动手了。庐山会议以后，一方面毛向做了检查的黄吴李邱表示“事情到此为止”；另一方面，又在南巡中大造整肃林彪的舆论。据邱会作的揭露：毛甚至在武汉军区公开挑动刘丰在未来的九届三中全会上直接向林彪发难。

一个党中央的主席，未经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散布整肃中央副主席的言论，并积极进行军事和组织上的布置，就已经是一场政变的预演了。

◇ 几代中共领导人集体制造的假案

一个问题会被自然地提出来：既然根本不存在着一个想搞“武装政变”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至今得不到平反？毛泽东难道真的相信有武装政变这回事吗？答案是否定的。

据邱会作的回忆：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就说过：“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换句话说，毛是有意制造这一假案，以便林彪为自己文革中的全部错误背黑锅。

但是，林彪案的审查前后经过了“中央专案组”（毛泽东和“四人帮”）——“高检预审组”（华国锋）——“中纪委”（邓小平）三代领导人，结论却仍然是空前一致的：“反革命集团”，这就不是以毛的个人意图所能解释的了。虽然邱吴的回忆录中也做出了一些解释，但给人的印象都还是浅尝辄止的。正确的解释应当是：从毛到邓的几代中共领导人，都还坚持着同一的“路线斗争”的深层思维，即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交锋无限夸大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殊死斗争。这样，战胜者一方就可以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制造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来作为自己“伟光正”的铺垫。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的“路线斗争”，也大都是类似的冤、假、错案。

◇ 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历史研究中切忌非此即彼的简单黑白论。当我们说“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是一出假案时，绝不是说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了。在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里，就流露出当事人过于抬高和美化自己和自己这一派系文革表现的倾向。例如，邱会作就把他们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政治分歧提高到“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他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林彪和他们自己写成是反文革的领军人物。这些写法都漠视了一个基本的史实：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意黄吴李邱进入政治局、并把持军委办事组这样的要害部门，绝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文革，而是因为林彪和他的部下最积极地支持了他的文革。至于具

体的文革怎么进行，尤其在军队中的深入，在林彪和江青等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但这些也大都是封建王朝中在服从绝对皇权下的文臣和武将集团间的互相贬低和攻讦。

当读者看到这些回忆录的当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也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时，我们又不无遗憾地感到：即便在这些共产党内的受害者的脑中，也还无法摆脱中共“革命”和“反革命”二元模式的深层思维。如果说当事人在回忆录中难免有选择性的记忆和自我美化的倾向，那么研究者在为一个历史沉案翻案时所说的一些过分的评价就更值得我们警惕。林彪的崛起和他在文革前大跃进、大饥荒等问题上积极为毛解脱救驾，在毛对彭德怀、刘少奇等的残酷斗争中的为虎作伥是休戚相关的。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斗争彭德怀的发言明明是无中生有地批彭德怀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并吹捧毛为党内的唯一的“大英雄”，但在有些研究者的笔下竟成了一种值得肯定的“正话反说”。又如，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因为在大跃进中的一系列狂热指示，导致了数千万人的死亡，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不满，正处于政治危机中。而林彪的发言，竟颠倒是非，用心良苦地把大饥荒的造成说成是“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以致毛对此当场赞不绝口，马上批发全党认真学习。

然而，今天的某些研究者，则千方百计地为林彪的这些劣行辩护。作为一个文革史的研究者，我既希望推倒“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样的假案、错案，又希望我们的研究能有应有的历史距离，不至于在合理的翻案中引出不合理的研究结果来。

□ 原载香港《动向》2011年第五期

~~~~~

## 【往事非烟】

### 走在大潮边上

• 唐晓峰 •

（唐晓峰，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一九七五年秋毕业，先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做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一九八一年留校工作。一九八六年到美国 Syracuse 大学地理系读书，一九九四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五年回到北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书至今。）

在那个年代，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考上男四中，是“前半生”一大功名，不管后来运势如何，这份小小的骄傲或虚荣都不会泯灭。

## ◇ 上四中

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院里的刘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在十三中。

万万没想到，发通知，四中要了我。那时考高中，报三个志愿，如果都没考上，据说也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发通知。在传达室拿到四中的信，心里悬着，打开信大喜过望，旁边的女孩儿扑上来打了我几拳。

我琢磨可能是作文把分数补回来。考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如获神来之笔，写一句是一句，一挥而就。我这辈子，状态超好的感觉有过两次，一次是写这篇作文，还有一次是插队时到县里比赛乒乓球。在决胜盘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我气壮如牛，连得七分，反败为胜。

还没开学，一个叫赵永明的“老四中”同学来电话（我们宿舍院有公用电话）。“老四中”同学，是指那些初中就在四中的。我们高中班，由原来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加上新考进的外校同学组成。在学号上，头十几号和后十几号分属两个初中班，中间十几号是外校来的。我学号二十九。

赵永明找我，是要筹备“十一”活动。我填写的各类表格中，家庭地址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宿舍”。尽管没见过面，他认定我可以做文艺骨干。

我果然帮了大忙，从北影免费借来十几套红军服装（拍电影用的）。在赵永明带领下，我们班排练了舞蹈“长征”，在学校评比中，成为最优秀的两个节目之一。另一个是高年级的“水兵舞”。那年“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跳了好几场。

第一天进四中校园，看见有人在树下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不久又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有些本事：赵永明朗诵，十分专业；陈哈尔推铅球（北京市少年冠军），铅球在空中横行好一阵；朱景文游泳（北京市少年冠军），姿势不怎么样，但速度极快；刘捷测向二级；李宝臣夜读《史记》；邵立功摇头晃脑，讲述各种大道理。

#### ◇ 开头的日子

“文革”前，我只喜欢自然科学，对文科毫无兴趣。上了高中，我参加北京业余体校航模组。这是个很正规的少年体校，拿出大量精致薄木板，任我们锯开粘合，制作机动模型飞机（配有小发动机，真可以飞天上）。寒假还要集训，天天泡在木屑和化学胶水气味里，但伙食好，按正规运动员标准，竟有油焖大虾。夏天，我还参加了后海舢板训练班，在大太阳底下“一二一二”划舢板。旁边的何大明提醒我：“小心咯破屁股。”

无论航模还是舢板，我都没长性。我最爱的还是攒半导体。几年前，在邻居郑保民叔叔（常演匪兵角色的演员）家见到他自制的小木盒居然能出声。“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他说。我从此着了迷，开始自攒半导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管耳塞机到七管超外差，还设计万能电表，自制多刀开关。深更半夜，焊好最后一个线点，接上电池，飘出美妙的声音！

转年班上来了王大理，他因病休学一年，插到我们班。他才是半导体行家，有一天，他拿出自制的线路板，小板焊接得极其精美，导线塑料皮统统剥掉，精心布局，互不交叉，真把我镇住了。从此我跟王大理攀上了，常去他家欣赏他的新成果，课上也偷偷交换线路板设计图。

几乎每礼拜，我都要骑车出去，趴一遍电器商店的柜台。商家深知我们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把新款收音机后盖打开，亮出“内脏”，摆在玻璃柜里，让我们看个够馋个够。

身边尽是有本事的同学，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刘钊老师的物理课我最喜欢），这是进四中最初的印象。四中也重视体育。我个儿不高，但投篮准，也成了班上篮球主力。虽说学习成绩不像初中那样总排前头，但眼下的日子倒挺合胃口。

#### ◇ 政治来了

生活总不会由着我这样玩乐下去。学校空气中潜藏着什么，浓度越来越大，我是渐渐意识到的。首先是听报告。印象最深的两次是听李瑞环（劳动模范）和李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报告。费尔巴哈这奇怪的名字，就是在李瑞环的报告中头一次听说的。

奇怪的是，政治课女老师讲课像报告，班主任开班会也像报告，把人说得热血沸腾、心情沉重。校一级的报告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通过有线广播，我们坐在各自教室，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原来在四十一中，没这么多能做报告的老师，只有大队辅导员贾老师的时代感比较强，校长则老气横秋。四中不一样。那些报告，道理夹着声势，声势夹着道理，搅得人灵魂深处不得安宁。核心是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做什么人？不是做科学家，而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习不重要，斗私才重要，因为做接班人要从小斗私、斗自己开始。人人要过这道大门槛。团员应该算过了一道小槛，接近接班人的标准，没入团的自然是落后分子，落后就证明还有私字，就得斗（起码自己斗自己）。好在我到家就把这些事忘了。

我有一张幼时的照片：五官端正，学生头，蓝制服，红领巾，左臂有臂章。有这副相貌的学生，都会受老师表扬，在班里总有一官半职。我从小学到高中，总是当官儿（只是级别越来越低，小学三道杠，初中二道杠，高中退队，在班上还是课代表，算最低级职位），但不会有政治，大政治是入团、入党一类，所需的条件我没有。初中时，我是中队主席，学习成绩优秀。一次，一个很淘气的同学对我说：“别看你，我入团肯定比你早。”我一笑而已。没想到，那同学不久果然入了团，而我一直没入上。后来上四中，政治开了窍，才意识到，那同学的父亲是“革干”。

那同学的家庭背景比起四中许多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四中的高干子弟多不淘气，我刚进校时，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工作积极，穿着朴素。我见同班的任志上衣有针补的痕迹，还以为他家庭困难呢。伍贻龄家离我家不远，放学常一块回家。路上，他一一告诉我，哪个同学（不光是我们班的）家里是哪种高干，让我连连吃惊。我那时想象干部家庭，天天夜里给儿子讲革命大道理，就像《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我对革命大道理敬而远之，革命不是我的事。我想求进步，但进步是件很难受的事，最难的是谈心，当年英语课本上译成“heart to heart talk”。我平生头一次谈心，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干部子弟，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那种感觉，比头一次搞对象还别扭。

革命无私心才能上战场，才能不怕牺牲，才能受得住老虎凳。我暗自想象自己坐在老虎凳上，肯定受不了，这说明自己不够革命标准。

我一直是满脑子科技人生模式，全然不知有政治一途。还有，虽然我们大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但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计划人生。一次晚上叫我去帮着配音，我老大不高兴，导演叔叔看出来，只好白送我一顿夜宵，让我回家了。

那年头时兴“忆苦思甜”。对旧社会不能忆出甜来，但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必须忆甜，忆完了好接着批判。一次全校大会，有个外班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大会上自我革命，先忆甜，说他们家当年吃的猪肉有“这么厚的膘”，说话间，他五指并拢，横立手掌，比划了一下。他的手势太形象，我一直记着，每次看到肥膘猪肉，都想到他的手掌。总的说来，城里人“忆苦思甜”不易，苦都在农村。

某次班会，出身好的讲光荣，出身不好的讲罪过，表示划清界线。那是第一次气氛紧张的班会，不知是怎么开的头，几乎人人要表态。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富农，也糊里

糊涂站起来讲了几句。我忽然知道富农意味着什么，心里吓了一跳。开始还没有什么，这和做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学校的气氛，就是要把我心里这一角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了一块心病大石头。看得出来，周围不少同学都有心病，脸色气质渐渐变了样。

中学也搞“四清”。“四清”运动告诉人们，你身边就有敌人的思想，甚至活动的敌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活人，挖不出来不算完。终于有一天，我们班教室后面墙上贴出了进步同学写的小字报，批判某落后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校的政治压力是从政治老师、校领导那儿蔓延过来的，某些进步同学也加入鼓动，于是乎，校领导和进步同学（多为干部子弟）渐渐拧成一股劲儿。

#### ◇ 讨论《海瑞罢官》

这件事开始还有点儿学术成分，引发了爱思考、爱发言的同学的兴趣。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组织讨论，同学发言挺热烈。讨论很快变成辩论。辩论时，站在报纸立场比较容易，现成的词儿很多。“反方”就不容易了，但因此也才有意思，学习好的、能言善辩的都愿意做“反方”。他们说的有意思，我们听的也有意思。

这次讨论不是脱离实际的课文中的陶渊明之类，而是外面社会上鲜活的大题目。有些同学又让我吃了一回惊。许健康引经据典，范泰林满嘴演说词汇，何大明情绪激动，观点出人不意。他们个个像小大人。校长杨滨大概听了汇报，在校园见到许健康，说：“许健康，你可真健康啊！”关于《海瑞罢官》的报纸文章我一篇没看过，但同学们讲得都很神乎，各有各的道理。抽象继续争论对不对？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清官能不能推进历史？我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看来还是姚文元水平高，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击中要害。

#### ◇ “文革”爆发

我永远记得作为“文革”爆发标志的头两篇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牛鬼蛇神”一词，早在近几年的政治词汇中就被使用了，现在升了级，要“横扫”，而且是“一切”。这“一切”里面都有谁？报纸上点名的除了吴晗，还有几个文人，他们已经被扫了，还要再扫哪些人？“触及人们灵魂”，据这两年经验，凡是触及灵魂的事，没有什么是好受的。多数人的灵魂自带三分罪，因为都达不到雷锋、坐老虎凳的水平。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了，北大成了革命焦点。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北大。大饭厅（后来叫大讲堂）门口有把门的，我们自称来取经，就混了进去。大饭厅很大，人很多，里面满是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顶端粘在绳子上，下面悬空，随风飘。

由于是晚上，气氛有点阴森，你一转身，不定看到哪个熟悉的大名竟是“牛鬼蛇神”。“啊，李晨？！”“啊！这还有彭真！”北大的人是得了内部消息，还是水平高，自己看出来的？半夜从北大回来，几个同学到我家，和衣过后半夜。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这不一定是上级指示，但“枪声就是命令”，革命号角已经吹起来，受了多年革命教育、一直等待革命机会、要实现做革命者梦想的各色群众们，投入革命大潮中。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盖子揭开，没有“牛鬼蛇神”可不行。我们的运动向来是：抓右派，没有不行；找活雷锋，没有也不行。现在是揪斗“走资派”，哪能没有！

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揪斗领导，校长、班主任就是眼前的领导，即使今天没揪，迟早也得揪。报上说要认清革命潮流，跟上形势，于是北京几所中学（有四中、八中等）联合召开了揪斗教育口“走资派”的大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一个个教育口的“当权派”被押上台，随着会场革命温度的升级，他们被勒令下跪、挂牌子、自我招供。张文松的声音纤弱，回话文绉绉的。“到底是领导，毕竟有些水平。”我心想。上台押送或主持会场的是根红苗壮的同学。记不得从谁开始，因为招供“不老实”，开始动武了！台上有人流血！这是我害怕但预感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忘记是哪一天，我们班也把班主任史老师的头发给剃了。当时把课桌排成方阵，大家坐在周围，让史老师坐在中心，由会用推子的同学执行。当时心情很复杂：我们终于也革命了，可实在对不起史老师，同时暗自庆幸，得亏我不会用推子。

#### ◇ 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那几天，高三的同学还在看书复习，准备高考。但忽然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四中、北京女一中同学“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嘿，到底轮上我们四中了！“文革”开始好几天了，一直没四中的事儿，习惯当老大的四中人有点儿着急。

当天晚上，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四中祝贺声援。我到学校看热闹，灯光中见到去年刚考进北大的老四中同学，站在高处向母校致意。大家知道倡议书是高三五班少数人写的，但身为四中人，也沾了点儿革命的光。

准备高考的人收心了，这可能是永远的改变。对善长考试的四中人来说，算是断了门路。课早就不上了，现在课本也不看了，同学们每天坐在教室聊天、辩论。

后来听说，是几个干部子弟先知道上边精神才写的倡议。看来革命需要有背景，普通人要想革命，只能懵着来。

#### ◇ 学马列

大家心中的革命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农民运动（造反不怕过火）、武装斗争（政治的最高形式），钻研革命理论（做革命导师或党内理论家）、革命檄文（以大字报一鸣惊人），构成了“文革”运动的基础。

不过这不是人人学得来的，许多都要有资格（比如上街斗人）。对于出身不够好的同学来说，革命的路其实很窄。读马列、研究革命真理，成为某些四中同学（不得不，只能）选择的进步道路。况且，上边也在号召“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毕竟是书生，不少同学相信马列书中有人类终极真理，可征服世界。赵京兴、许健康是这方面的厚重代表。赵京兴在同学中很有知名度，他以理论见长，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流行观念，马列语录张口就来，辩论时拿他没辙。对这样的人，我们既佩服又担心。当时有人把满口经典理论词汇的人称作“克思”，去掉“马”字，换上个人的姓，比如“赵克思”。克思，代表诚恳、厚重，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克思”们只恨缺少大胡子。

“文革”初期，我与郭海军“一对红”，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一个先进的帮一个落后的。郭海军是我们班团支书，约我认真读毛选，逐字逐句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这类书。因为认真，小有感觉。我后来自己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读读到深夜，真是读进

去了，顿悟开窍，激动万分，在桌子前头直转悠。由这本书，我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是“主义”。以前感兴趣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实验的东西（物理、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现在打开一片抽象的天空——“原来这就是辩证法！”

也可能是学得不彻底而落下了毛病，辩证思维害得我黑白不分，左右难辨。每件事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英语“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很亲切）。见那些同学爱憎分明、言语痛快，很是羡慕。对我来说，真理越想越乱。多年后读陈独秀所言：“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真不愧是廓清云雾的大时代先驱！

赵京兴日后评论自己说，他的思想习惯是从怀疑出发，遇事先疑，然后证实。这又是我所不及的。我的特点是接受现实，遇事倾向于理解，寻求解释，这大概是从自然科学那儿来的。

我发现领头的干部子弟其实不读马列，而是读内部政治书，甚至是敌人写的书。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政治，而书生与政治无法同步。

学习归学习，话又说回来，在革命大潮中，比的是疯狂，不是理性，要“忠”不要“理”。那其实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人们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只是学会了豪言壮语，学会了挖苦损人，学会了诡辩上纲。

不过，写传单大字报，倒也是个练字的机会。有一阵，我负责刻蜡版、印传单，摸索出一种快速字体，像隶体，扁扁的，看着很整齐。有一回形势紧急，伍貽龄口授，我刻蜡版，一张传单转眼完成。还有一回写大字报，因为毛笔顺手，那字迹连我自己都吃惊。宋德镇在旁边边看边夸：“你小子肯定是一笔一划练过。”我自然很是得意。

#### ◇ “老子反动儿混蛋”

某天，学校里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看了，心里一紧。我出身职员，不算“反动”，但那股杀气照样令我战栗。那明摆是错的，我们都摇头，但也知道，此刻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从“对联”得到好处的人，正在社会上疯狂造势，别人没有吭声的份儿。

校园里传出《鬼见愁战歌》。关于“对联”，社会上很快生出变种，原来横批“基本如此”，有人觉得不够狠，改作“绝对如此”、“永远如此”，“鬼见愁”等。《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刘辉宣作曲，我现在还记得那曲子：

1 • 1 5 5 | 5 3 1 2 — | 1 • 1 5 3 | 2 1 5 — | 6 • 6 5 5 | 1 5  
1 2 3 2 3 | 6 • 6 5 — | 3 1 2 2 1 — | （注：红字下面加点，是低音。）

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此结束，接着是叫喊：“滚一滚一滚，滚他妈的蛋！”最后的“蛋”字喊得最响亮。这是仅次于《造反歌》的中学生“革命”流行歌曲。无论男生女生，张嘴“他妈的”，成了革命激情词汇。

“文革”开始了，我们照样下乡劳动，没干两天，突然接到回校通知。校园气氛异样。教室里播放北大附中彭小蒙的讲话录音：“江青同志感动得哭了……”什么什么的，声调激昂。又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撤消工作组。



一天，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冲进教室说：“海淀红卫兵受压，我们得去支持……”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红卫兵”。没几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名声大噪，引领时代潮流。

某天下午，忽见穿旧军装的同学云集操场转圈喊口号，不用说，他们都是“红五类”，都是“好汉”。原先班里除了几个身份明确的干部子弟，还有谁是“红五类”，我并不清楚。他们现身操场，我依次查看，噢，他，还有他，原来他们也是“红五类”。其中好几个人，原来都很谦和质朴，如今夹在气焰万丈的队伍中，也跟着挥舞臂膀，高呼口号。

阵营变得泾渭分明，我从教室望着操场，感到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那几天，干部子弟纷纷换上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将校靴，佩戴红袖章，显出逼人的英姿。比如刘辉宣，他虽然不是我们班的，但我对他印象深刻。那年春天筹办校运动会，我注意到有个身材不高的人反复苦练跳高，直到黄昏仍不罢休。他朴素执着，还以为是工人子弟。可如今他戎装一身，在校园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起初非“红五类”不准带袖章，后来成立“新四中公社”，才人人有权戴袖章。我的“新四中公社”袖章现在还留着。

在“红五类”、“黑七类”之间，按张育海的说法，还有“麻六类”。我听了，觉得好玩，也对，中间的混乱如麻，左右不是人。

许多地方都搞起“对联”辩论会，那根本不是什么辩论，而是以势压人。我去过灯市口中学的辩论会。强烈的灯光照在台上，“红五类”排队上台，在麦克风前厉声叫喊：“我出身革军！”（欢呼声热烈）“我出身革干！”（欢呼声热烈）“我出身工人！”（欢呼声一般）。台下出身不好的都沉默着。沉默干嘛还来？是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最好是“红五类”）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基本没有，绝大多数没这个胆儿。

四中干部子弟中有头脑的人私下说过：“谁真把对联看成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但现在需要这么说说。”潜台词是：过去对“狗崽子”们压得还不够（虽然早就受到限制，比如不准上大学），非得叫他们彻底屈服不可。

从“对联”开始，我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原有的敬意全无（与个别人还是朋友），他们身上再无父兄折射的光芒，只剩特权带来的狂傲与利益。而在另外的群体中，却有着真正的智慧、才华、幽默与尊严。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这两大群体间的冷战热战，渐渐成为中学生的主旋律。要说这两拨人根基都不弱，成熟干练，满嘴马恩列斯毛的大道理，背后可大不一样。差异不是嘴上决定，是背后决定的。一边是说对了也没用，另一边是说错了也没事。高干子弟中的党员不再是学生，他们早就准备接班了。“文革”一开始，从校一级到班一级，领导都换成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虽属“红五类”，但地位不高，他们的父辈是老干部的群众，自己则是干部子弟的群众。

“对联”在社会上逞够了淫威，才被上边叫停。此后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明戏，每次填写人事表格，上面都有“出身”一栏。填表填到这里，不同出身的有不同滋味。出身一直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党的政策虽然不“唯成分”，但还是要“讲成分”。这包袱直到改革开放才卸下来。

## ◇ “八一八”

前一天得到通知，要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说有大首长出席。校方要求每班先确定参加者名单。我们班坐在教室桌子上开会评选。我是一般人儿，没问题，但说话尖刻的刘捷没选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是团员，还一直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呢。

那天排队出发，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中被安排在正面偏东的位置，离城楼很近。我在一个灯柱下，眼见着各校一队队人陆续到来。

等了好一阵，城楼上还是空荡荡的。忽听大喇叭喊：“各校派X名红卫兵到天安门下集合，有任务。”当时还以为是叫去执勤，站岗维持秩序什么的，学生领袖们都没走，而是派了些勤快的人手。没想到，他们很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地向下面的人挥手。我非常吃惊：“豁！居然让他们上了天安门！”革命总是出新招。

原来空旷的城楼上显出热闹气氛，渐渐，人越来越多，有些显然是首长。

不记得是否伴有《东方红》的乐曲，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中心位置。我是远视眼，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没穿军装，一身灰蓝制服，也没有与毛、林站在一排，他在前面一排，台阶位置低一点，身边也没有簇拥多少人。周总理的身影很明显，穿浅蓝色短袖衬衫，在上面来回走动，像是在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

林彪讲话，显得气力不足，声音尖细，与我期待的差别很大：他是大元帅，名字又是“彪”，应该铿锵有力。好在讲到“立四新”：“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声调忽然悠上来，加上湖北口音，有些力量。再就是讲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是这样。事后看《参考消息》，外国报纸评论，也说林彪这几句话讲得有些力量。

彭小蒙这一阵正出名，她上来讲话，一点也不意外。我记得她的豪言壮语：“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她口齿凌厉，飒爽英姿，皮带一扎，效果比男生强。

还有谁讲话，忘了。

讲完话，毛走到城楼西头，招手，我看到那身姿，十分英武，有统帅的样子。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姿势肯定会有照片特写。

散会后，大家自由往回走。我碰上同班的杨英杰（“红五类”，但不是高干子弟），他劈头一句话：“我他妈上城楼子了！”他接着激动地说：“想跟毛主席握手，挤不上去，一回头，看见刘主席旁边人不多，我上去就满手握住……我站在李聚奎旁边，让他签了字，你看——”他掏出小本让我看。我原来不知道李聚奎，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报纸登出了许多照片，引人注意的是干部子弟们。宋彬彬走到毛主席身前，报上自己名字。毛问“是哪个彬彬？”“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几天后，听说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一八”过后，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上掀起“破四旧”的狂潮。“要武”的

社会作用很快显现，大批“黑五类”分子和“流氓”被殴打。北京城充满血腥的恐怖气氛。

一天我进校门，看见花坛被抽得一片狼藉。到处贴着标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 “西纠”

海淀区“红五类”创造了红卫兵的奇迹，四中的不甘示弱。“八一八”以后，社会秩序大乱，一拨拨红卫兵为所欲为，借这个机缘，以四中干部子弟为主，成立了“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最初的目的是要管束街上红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当然，“西纠”的头头自认为比一般的红卫兵要高一等。不用说，比一般老百姓就要高好几等了。

“西纠”发布了一连串《通令》，宣布某些革命纪律和公共政策，印成一大张一大张的，贴到大街上，比警察的话还管用。有些内容我觉得还不错，比如实施多年的晚间骑车要带灯的规定（连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也提到），被某号“通令”给取消了。《通令》说，北京城大街上路灯明亮，骑车没必要再带灯。我很拥护这一条：晚上骑车总有警察或志愿者找麻烦，没有灯，就得推着走。北京人的车灯，从此成了家中犄角旮旯的废物。

不过，“西纠”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快就与更“革命”行动对接了——“西纠”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比如，六中劳改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西纠”的名声很快就完蛋了。

我们班有几个人，批判“西纠”最勇敢，最有力。那一阵，我们常聚在教研室小院某间小屋议论时政。一天晚上，王祖镔提出到“西纠”总部门口去贴大字报。这可太悬了，那帮人说打就打，铜头皮带抡起来，很危险，没几个人敢去。王祖镔说：“那有什么，你们不敢去，我去。”他果然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毛主席、林彪外，中央首长悉数出席。王祖镔上台做主题发言，批判“西纠”。有人照了照片，前面是念稿子的王祖镔，后面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这次大会标志着“西纠”的终结。

批判“对联”、“西纠”，还有后来的“联动”，令干部子弟大受挫折。很多人不服气，于是喊出著名的口号：“二十年后见高低！”

其实干部子弟中也出现分化，因父辈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弟底气没了。我们班陈小田，大串连出发时还是队长，路上看到批判他父亲的大字报，就地被免了职。最早那批红卫兵不到一年就“老”了，为了与新红卫兵区别，被称作“老兵”。批判“血统论”后，所有学生组织均可自称红卫兵，于是红卫兵满街都是了。

#### ◇ 我们高二（二）班

“文革”高压，我们班的“黑五类”、“麻六类”却没怎么退缩，很有几个敢干的人。再有，按何大明后来的分析，因为班里“红五类”的小首领邵立功与学校那些大头头们有矛盾，隔着邵立功，大形势渗透不进来，于是我们高二（二）班的气氛有些不同。

班上辩论“对联”，反对的声音很大。杨百朋反对“对联”，对方称他为“混蛋的平方”，也

只不过是借助外边的声势，在班里没什么作用。听说牟志京到外校公开反对“对联”，差点挨打。他坦定、自信，从不大喊大叫，但胆量过人。他从不在班上结伙，独往独来，到社会上结识了遇罗克。牟志京与王建复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轰动社会。随后，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何大明等人又办了《只把春来报》（“报”字双意），登了张育海的《论出身》。那阵子，常见张育海等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报。

我们班的“非红类”成立了三个战斗队：“长征”、“卷巨澜”、“星火燎原”，合称“长卷星”，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妖星。三个战斗队合而不同。

“星火燎原”有许健康、王祖镠、伍贻龄、朱景文、黄琪等。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在批判反动路线、批“西纠”等事上贡献不小。许健康（我们称“老许同志”，是模仿《红岩》中对许云峰的称呼）是北京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王祖镠和吴宝麟，都是四中“大联合”后的校革委会副主任。

不少重要的批判稿是由朱景文起草的，他还热爱朗读其文。我们半真半假，夸他的声音像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男播音员，主念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

我和任志、陈小田、王大理、赵永明等在“长征”战斗队，我们最喜欢大串连，打算徒步去井冈山，买了绑腿、“红卫兵长征地图”等，就等开春了，故叫“长征”。比起“星火燎原”的人，我们玩性大些。一九六七年夏去成都，住在西南局大楼，正赶上武斗，在子弹的呼啸中讨论下一步任务。我们说要去桂林，黄琪则批评我们“抓军内一小撮”不认真。

“长征”战斗队占了生物教研室，里面有架钢琴，我在那学会了“乱弹琴”，后来唬了几十年。没想到在那儿的贮藏柜见到杨百朋家的相册和照相机等，估摸是我校红卫兵从他家抄来的。一二零相机好像已经坏了。照片显然都是解放前的，打扮庄重，很有身份的样子。

生物教研室有个大桌案，我们开会，也包过饺子。那次过年包饺子，大家分工，我擀皮，王大理找肉，何大明偷食堂的白菜，他溜墙根偷白菜，我在后面望风。我们常常“战斗”到半夜才回家。

王大理热心，认识各校不少人，他脑袋大，张育海叫他“交际瓜”。任志记性好，尤其善记事实真相（后来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上级可算知人善用），他是保校长杨滨的重要人物。

杨滨的专案问题集中在一份会议记录本上，有几句杨滨的话很“反动”，有点不像是真的。于是其真假成了侦辨的焦点。有一天晚上，在阶梯教室举行伪造记录“听证会”，是“保杨滨派”组织的，张育海、孙沛都出场为杨滨辩护。张育海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带上围脖，像“五四”革命青年的样子。孙沛考证细密，娓娓道来，根据记录本上字迹的颜色、摩擦程度论证其伪。

“卷巨澜”（简称“卷派”），是一帮才华横溢的“痞子”，有张育海、吴景瑞、李宝臣、杨百朋、刘捷、何大明等。这帮人的性情与那个时代反差最大，压力也最大。参加“文革”，他们是半真半戏。

不管什么关头什么事件，只要张育海在场，都是中心人物。赶上班里讨论（或辩论），他既有见解又有乐子。某校运动形势吃紧，张育海偶然在场，大家素不相识，因其见解过人，部署合理，当即被推为司令。但熬完夜到第二天，这位司令却不见了。

杨百朋被张育海誉为“班里最聪明的人”，相对论的原理，就是我高一刚进校时听他讲的。

吴景瑞不善言辞，但心大，有毅力。一九六五年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挖了一天土，够累的，收工往回走，他却挑着两个土筐，里面各放一块大石头，摇摇晃晃走在队伍后头，为了炼出铁肩膀。他在大串联中神秘消失了，不知所终。李宝臣文科底子好，经常与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辩论。我是语文课代表，毛老师私下对我说这个学生其实不错。“斗批改”时，他去颐和园参加“运动”，住当年皇家房舍，我去转了一圈，正值夏天，里面很是阴凉舒适。中学期间，宝臣多次造访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得知不少清宫秘史。

“卷派”自然而然与遇罗克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常听他们讲遇罗克哥儿俩的事。他们的观点、言行，总是与革命主流格格不入。

#### ◇ 复课逍遥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都被叫回学校，有军代表进驻管理，每班有个排长（其实是战士）。回到学校并没有什么“复课”，“闹革命”也是虚的，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逍遥起来。我也看明白了，这革命，底下怎么“闹”都没有用，一切都是上边说了算。

除了继续攒半导体，还多了一样，我开始拉手风琴。手风琴是从北影借的，120贝斯。我们班一下冒出三个拉手风琴的，除了我，还有陈小田、赵颐庚。小田和我一样是新学，赵颐庚练得早，已有相当水平。陈小田拉琴不连贯，一顿一顿，听着让人着急。杨百朋评论说：“小田拉琴像拉屎一样，赵颐庚拉琴像撒尿一样。”我善拉革命歌曲，只要会唱就会拉，很实用。我和赵永明合作的手风琴伴奏《红灯记》，后来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还有张育海拉小提琴，蒋效愚打扬琴，杨百朋吹黑管。一天，杨百朋吹“阿拉伯舞曲”，让军管“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对面北医礼堂开全校文艺联欢大会，轮到我们班，呼啦啦上去半个班，人人手持乐器，真真假假排出乐队的规模，引起台下一阵骚动。

大家都喜爱文艺活动，于是有人出面组织正式的合唱队。报名的不少，我们班赵永明、陈小田、渠川屿、范泰林、张幼声、伍贻龄、刘勇，还有我，都报了。分高低音部，我们都争当男高音，没人挑低音部。音乐老师曹汇澄动员说：唱高音只是唱主旋律，容易，而唱低音难度大，因为旋律不同，所以唱低音的才水平高。我们几个改挑了低音部。

合唱队还需要一半女生，都是从附近三十九中请的。四中的老爷们没有“处过”女生，于是殷勤备至。张育海赞扬朗诵的那个小女生有“深情”的眉毛。

排练大合唱《红卫兵组歌》（其实是造反派组歌，造反派的狭义概念是指受过“血统论”压迫的），曲调套用流行的《长征组歌》，歌词由语文老师李颐扬改写，有“国防科委擒如璋”（揪斗“走资派”），“何处青山埋忠骨”（大串连），“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造反派想念毛泽东”等。唱到“中央文革”，背景大幕上出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照片。人们认为“中央文革”救过造反派。

在合唱队，我们班赵永明是台柱子，又唱又朗诵，声音浑厚，相当“男一号”。蒋效愚去新疆串连，回来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老蒋凭着一手新疆学来的手鼓，终于挤进合唱队。没过多久，他倒成了主心骨，合唱队头头们开会：“老蒋没来商量什么劲儿，得等老蒋来！”

“老兵”也组织了合唱团，由刘辉宣任指挥，不记得唱什么歌。有一天建校“飞虎队”闯进四中，个个头戴柳条帽，武器有铁刃和螺丝母弹弓。他们找“老兵”寻仇，杀气腾腾，一下

改变了以耍嘴皮子为主的校园气氛。“老兵合唱团”正在食堂排练，一见“飞虎队”那架势，四散逃离，逃得最快的数四中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很快从后面翻墙而遁。刘辉宣是指挥，背对“飞虎队”，毅然站立，直到最后一刻。

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复课闹革命”期间，也常有游行任务，每班一个方队，全校走成一条长龙。每班有个带头喊口号的，我们班是蒋效愚。他嗓门巨大，别的带头喊，只有本班听到，老蒋一声吼：“打倒某某某！”，只见前面五六个班的人跟着挥手呼应，声势壮观。

#### ◇ 又去“串联”

“复课闹革命”不到半年，学校又乱了，我们趁机上路，这是六七年夏天。

头一次“串联”是六六年九月，我们去上海，那次上面最支持，我们最舒服。住在华东师大，白住白吃，每天逛大上海。当然，也要摆出几分革命的架式。我们乘公共汽车，宣读“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不知从哪儿捡的），传单用的都是狠词儿，车上的上海人一声不吭。下了车，我们消失在上海食品商场的迷宫中。

有一次在饭馆吃晚饭，不知怎么与上海人呛呛起来，后来演化为大辩论，招了一屋子人。我们这头有几个“红五类”，目中无人，横竖有理，把上海人气坏了。大概是谁讲了“中央的人也可以反”，有个站在高处的上海青年激动地喊：“誓死保卫党中央！”他的手举在头上挥舞，差点碰到旋转的电扇。

后来还去了北大荒赵光农场，白天坐马车收玉米，晚上访问上海老知青。那是冬天，天气寒冷，我们都在鞋里塞了乌拉草。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去西南，上面已明令禁止白坐火车，只有另想别的招数（包括坐车厢顶上、搭货车等），一路辛苦。我们从成都转到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游山玩水，品尝各地小吃，也目睹了武斗场面。从广州回来，火车已被严格管制，扒不成了。出路只有用学生证借车票，事后还钱。我们几个借票时都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改了，任志改作李林，宋建华改作勇求实，我改作唐逢喜。四中收到催债名单，发现大多数都“查无此人”，我们班只有王大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老实实还了钱。

从广州回来，不但没车票钱，连饭钱也没有。头一顿饭我们都不买，两位北京铁道学院（后改为北方交大）的大学生问：“你们怎么不吃饭？”“不饿。”第二顿饭我们又不买，大学生问：“你们是没钱吧？”大学生马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份盒饭，后来顿顿买（如今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真是忘恩负义）。到北京下车后，我先到学校，因为头发长，脸黑，衣服脏（现在说，有点像犀利哥吧），进校门把一个同学吓了一大跳。多年后他还老提这件事：“你那回那副德性真吓人！”

#### ◇ 离开四中

上面不让我们老泡在学校，开始叫我们到社会上就业了。这是大势所趋，当时的说法是新

的革命大方向。有去北大荒的。老蒋在张罗去新疆，但没什么结果。我迷迷糊糊的，工厂对我没新奇感，“文革”中我去过北京无线电三厂“学工”，无聊。

一天早上到学校，门口小黑板写着“内蒙古土默特旗下乡插队，自愿报名”。我看了也无所谓。碰到陈小田、任志，他俩拿着地图，说土默特旗虽然在内蒙古，其实不算远，而且在铁路线上，要去插队，这个地方还行。越说优点越多，越说越觉得合适。

插队看来是躲不过去的“大方向”，插就插吧，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上午敲定下来。我心想，到农村插队也只是个过渡，总不会有去无回。下乡劳动不也好几回了吗？先走了再说。

很快赵永明、黄钧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进村不久，蒋效愚、王大理、陈捷也赶来了，形成我们班内蒙插队的一伙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土默特。车上陈小田拉手风琴，赵永明唱歌，似乎豪情不减当年。

四中的岁月结束了。

一九六九年夏秋，在山西山阴县插队的刘捷来我们村玩。我俩坐在哈素海的岸上聊天。刘捷说：“你们这儿干得还不错，不过你的志向恐怕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县吧？”我说：“那当然了！”其实我底气不足，但不能说软话。现在回顾我的官运，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只是生产队长，在农村垫底。后来到学校当教研室小头头，在学校垫底。被任命为教研室头头时，我说：这是平级调动。现在系里的会计还叫我“生产队长”。

那时我妈常说：“上了四中，尽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不上呢。无线电没干成，手风琴也没干成。”

□ 原载《暴风雨的记忆》

~~~~~

【亡灵祭坛】

有感于刘素菲之死

• 王民权 •

1979年考学出来，已经24岁了。此前一直蜗居蓝田老家，虽说不甚荒僻，但刘澜涛这个名字虽早就有所耳闻，刘素菲则其人一点儿信息不曾知道，更别说知道他们还是夫妻关系。最早接触这个名字，大概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当时我还在西安市档案馆供职，每日公务闲暇，便去库房翻阅旧档。这是我多年从档养成的习惯，也是我从档廿年干得最多、最持久的一件事情，如果说这些年我的若干文章，有些鲜为人知的内容，有些不同与他人的味道，有些特别分量的话，原因盖在于此。可能是因为千里青《紫藤园夜话》的《校园里的“拗相公”》提到西北大学孟建凯教授“文革”中曾有“炮打中央文革”之举吧，那段时间忽然对西安“文革”有了兴趣，想看看到底当年情况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从市政府办公厅移交的部分“文革”杂件开始，不分重要与否，挨卷齐翻。翻着翻着，没想到一日翻出了一份不知作者的《简报》，标题竟是《刘澜涛的臭老婆刘素菲之死》，内容如下：

67年12月31日上午8时30分刘素菲跳楼而死。

刘素菲最近一个时期，被西北局机关临指看管受审写材料，关在西北局机关7号楼2层某一房间。

12月31日（星期日）上午8时10分左右，临指办公室肖××同志，还到刘素菲房间看过一次，只看房门有些开着，肖把门拉严后，就到6号楼洗脸去了。约8点30许刘素菲从2楼走到3楼阳台跳下摔躺在屋檐下水泥地上。

有一农工部干部的小孩来7号楼找他的父亲，看见有一人躺在那儿，进屋就大喊大叫。几个临指战斗员和解放军同志也去看这时肖××也从6号楼洗完脸回来，认出是刘素菲。

约8点50临指战斗员雷××、张××就把刘素菲用汽车送往西医第一附属医院。进入急诊室，大夫检查了一下，外部未有伤，头部有擦伤，大腿根部摔断。此时，刘素菲看来脑子清楚，还喊叫腰痛，拉着大夫的手要看腰。大夫说要进行腿部透视，但无电不能进行。医生在刘的腿部绑上木板。

由于该医院是两派，推脱。这时雷××、张××回西北局向八一三三接待站和支左委员会反映情况，想叫部队开一介绍信把刘拉到市内某一医院去。部队说这事应由本单位管，无结果。

这时西医附属第一医院打来电话（上午11时左右），说刘素菲病情恶化。雷××等又到医院，医生打了樟脑针，拿来氧气瓶，做人工呼吸，但这时呼吸已很缓慢，一分钟才能呼吸一次。

11点35时刘素菲就一命呜呼！

人死之后，临指负责人刘××、程××等到医院现场。刘死之后，从刘身上搜出有：手表一只，小日记本一个，小刀一把，绝命书一份。

心头不由一惊：原来刘素菲是西北局第一夫人，“文革”开始仅半年就自杀了，而且死得如此悲惨！不错，“文革”中自杀的人太多了，如邓拓，如吴晗，如老舍，如傅雷，还有以群、翦伯赞等，就是西安，也还有徐步、海涛、张少康三个正、副市长，虽然其自杀的方式各种各样，揣其当时的想法，恐怕都是只求速死，像北大汪篪教授喝下敌敌畏后，痛得疯狂号叫以头撞墙，已经够惨的了，不料还有像刘素菲这样摔成重伤，硬是不救，眼睁睁把人折磨死的。政治之杀人、“文革”之惨酷和人性之残忍，真是于斯可见一斑，堪可叹为观止了。不知道当时的人们何以心硬如此，麻木如此！难道他们和刘素菲其人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吗？好像不是。就是因为她是西北最大“走资派”刘澜涛的夫人，本人按照彼时流行的说法，也是个“走资派”（西北局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而且据说是个康生直接点名的“特务”（1967年8月，康生接见西北地区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说：“刘素菲是个特务，为什么不批斗？”责怪造反派不该“打内战”，“把大特务刘素菲放在一边”）。我想弄清这份简报是谁家的，期望借此找到关于此事更多的线索，但是很遗憾，带花边的报头上，只是“简报第65期 1968·1·3”三行字，下面就是说诗不诗的几句话：“顽固派顽而不固，刘贼婆跳楼自杀；狗改不了吃屎，叛徒临终不忘反党。”什么叫“顽固派顽而不固”，就是讽刺人跳楼跌坏了；什么叫“刘贼婆跳楼自杀”，人死了毫无怜悯还要出恶语侮辱之；至于“狗改不了吃屎，叛徒临终不忘反党”，则是指刘素菲弃世前忍辱含悲所写的一份绝命书：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30年的革命，在党的教育下，我是忠诚的努力的想为党做点事，但是我因为人生观没有得到认真的改造，功小于错误。特别是我隐瞒了历史上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问题。这是我最大耻辱和对党的欺骗！

但我不是反革命！我更没有叛变过党！！

为了党的事业的（须）需[要]，我永生不再说话了！我对文化大革命是犯了错误的，但是我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是创造了反修防修的典范！但为什么现在要大量的杀害老干部而不改造？更加使我私心作怪的，是杀害了我的几个孩子们！我认为这不是毛主席的主张！灭了我的全家，这中间有阴谋！

绝命书全文就附在这份简报的后边，落款日期为“1967年12月21日”。如果这个时

间不错，则刘素菲10天前就已经决定离开人世了。按说这不是没有可能。据《中共往事钩沉》记载，刘澜涛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出来后，刘素菲便被造反派隔离审查，“逼她揭发丈夫的‘叛徒’罪行。还把保险柜上的铁门，用铁丝拴挂在她的脖子上，押着她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游斗。铁丝深深勒进她的肉里，沉重的大铁门勒得她昏倒了，造反派揪着她的头发提起来，便是一顿毒打。游斗过后，把她关在一个地下室，几天几夜不给水喝，不给被子盖，不许睡觉，任地下室的蚊叮虫咬。专案组还把一堆破旧的鞋子用绳拴起来，挂在她的脖子上污辱她，一面向她喷射污言秽语，一面把燃烧着的烟头，从她的衣领里塞进去。刘素菲硬是用自己的皮肉去熄灭了一个个火红的烟头。愤怒的刘素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天晚上，刘素菲回到家里，孩子们看到妈妈满脸是伤，衣服上血迹斑斑，两臂和双腿红肿，当他们含着眼泪给妈妈换药时，从她的衬衣里面竟然掉下许多烟头来。孩子们看到妈妈前胸后背到处是紫黑溃烂的烧伤，抱着妈妈失声地痛哭。”1967年8月康生恶毒授意后，“专案组对刘素菲的逼供和迫害，更加残暴更加升级了。严冬，他们不许家人给她送棉衣，每天有三个打手轮番对她进行逼供，她一次又一次地晕倒了，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水泥地上撞，撞得她头破血流，头发被一绺一绺连着头皮拽了下来。”无休止的批斗，无以复加的羞辱和当时不断有人自杀的环境都有可能催生她的这种念头。然而我总怀疑，这个“12月21日”是“12月31日”之误，或者说，打印时将“31”误打成了“21”（否则我还会怀疑）。因为作为妻子，丈夫自被揪斗离家后，至今生死不明，作为母亲，四个孩子横遭株连，至今个个不知去向，而作为一个资深的革命者，如今自己竟也沦落到这步田地，她既有心中难以冰释的牵挂，也有身负倍感委屈的冤情，这时如何可以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再说，如果真是“21日”，造反派一定会以其早有此心大做文章，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但是12月31日就不一样了，丈夫长时间没有音讯，孩子也长时间没有音讯，形势日趋恶化使她怀疑丈夫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几个孩子也已被人杀害，党不要她了，家也不复存在，她是彻底的绝望了，觉得这个让她痛苦万状的世界，再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了。然而当此之时，让人至今感慨不已的是，她在已经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居然还不忘呼两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不忘对党和党的事业可质天地的忠诚，不忘对使其全家横遭迫害的“文革”的歌颂和对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的信任。虽然，这上面也有她给自己的辩白，甚至还有对大量迫害老干部这种荒谬做法的感愤交加的质问，和对灭其全家阴谋的怀疑。

面对这份简报，面对简报上的文章和绝命书，我的心绪十分的复杂。明明曾经是头提到手里闹革命的，竟因为无端的株连和历史上一点点小小的污点硬把人弄得家破人亡；明明是身被奇冤、满腔愁怨，临死之前却还要委屈地恭维当世有话不敢直说，世事黑白颠倒，心灵扭曲压抑一至于此，彼苍者天，真叫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就是所谓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革”，这就是“文革”荒诞真实的一面。我不知道刘澜涛知道这噩耗后，是怎样的心情，也不敢想象刘澜涛的子女们听说事情的真相后又是一种情景，但沉痾在身的母亲“文革”中武斗初起一半因病一半因为担惊受怕的郁郁以终，使我想到的只有一个词：锥心泣血，给人的伤害和印象，应该是太深刻了。将心比心，不说别的，单从这一点讲，我就很赞成“否定文革”这个提法，莫说“七八年来一次”，就是永生永世也不希望它卷土重来！因此，感于党晴梵先生（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被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活活毆毙家中，《西安市志》竟轻描淡写地说其“1966年9月逝世”，感于朗照法师（前西安卧龙寺方丈）不堪红卫兵“破四旧”对寺庙的破坏服毒自尽，《西安市志》竟奇怪地说其“1966年圆寂”，特别是有感于刘素菲如此惨死，《陕西省志》竟也笼统地说一句“遭到林彪、康生、江青等的诬陷和残酷迫害，1967年12月31日含冤去世”，感于其措辞一个比一个简约，一个比一个轻飘，一个比一个冷峻甚至无情，而又统统相当一致地丝毫不曾触及各自死亡的真相，我曾写过一篇《否定“文革”何以如此艰难？》的文章，觉得这有违“志为信史”的原则，有意无意地阉割或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与方志客观真实的要求相去迥远，将使中央“否定文革”之宏旨因其无所寄托而成为一句标签式的空话，其负面之影响不可小觑。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并且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各志如此处置的严重不妥。这是一段曾经确凿发生并且不为后人意志为转移过的历史。死者已矣，有些

事情是可以过去的，有些事情则说死都必须记住，不仅现在的人要记住，将来也要有人能记住，不仅嘴上要记住，而且要形诸文字，传诸后世。刘澜涛不是完人，他在西北局任上的一些做法，譬如长安社教、整胡耀邦等，伤的人是不少；刘素菲也不是完人，如她临死之前坦承的隐瞒历史上曾经加入国民党一段，也颇为人诟病，但这显然都不能构成他们活该遭致迫害的理由，更不能说死了就死了，强以曲解的“宜粗不宜细”和“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借口，噤噤嘴，连其死亡的真相都不敢载诸史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人既为人，分歧、争斗自然不能说就没有，然而仁者爱人，不问壁垒，互相之间起码的悲悯情怀、恻隐之心，还是应该充分葆有的。这是做人的底线，轻慢不得，亵渎不得，突破不得，不然我们将何以为人，又将何以保证“文革”狂飙不会重新刮过！谁敢保证斧钺只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不会加诸己身？

但愿善良的人们，都能从历史中读出应有的警惕。

□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11年5月

~~~~~

【难忘岁月】

惊魂万里——一段长达四十年的误会

• 杨昂岳 •

1952年下半年，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开始筹建时就办起了建军小学。早期学生不多，全是哈军工老干部、老教师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

2009年5月8—11日，我们哈军工建军小学1956届校友在上海浦东聚会，到会16人，分别来自哈尔滨、北京、太原、长沙、安徽、连云港、南京、杭州、上海，我们之中有些人已五十多年从未见过面了，此次重逢，容颜已难辨认，但从笑容上仍能看到童年时的影子。我们这群65—67岁的“发小”，聊发了少年狂，嘻嘻哈哈，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聊到下半夜两点多，才被组织者“赶”去休息，到了宾馆房间，躺到床上还要说上一阵子。我们回忆童年住校生活的糗事、趣事，谈各自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和家庭情况……。我们的父辈，无论是老干部，还是老教师，在“文革”中都无一幸免地遭受批斗，这就使得我们在青年时代历经磨难，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董霭鲁同学向我讲了他“文革”中的一段经历，令我震惊不已，也消除了我对他四十年的误会。现据追记把他写出来，并多次与董霭鲁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修改、核实成文，作为我辈在那“史无前例”时代生活的一个缩影。

◇ 董绍庸教授

首先要介绍一下董霭鲁的父亲董绍庸教授。董教授1916年生于杭州市，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在抗战后方重庆、昆明工作了几年；1944年10月考取公费留学研究生，1945—1948年先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玛丽皇后学院、美国俄亥俄大学学习，1948年5月获俄亥俄大学硕士学位；1949年回国，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即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部分员工在香港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他们把12架飞机及价值不菲的配件、仪器仪表运到北京、天津，成为新中国组建中国民航的起步家底；1950—1952年先后在中国民航局天津分局和北京机务处工作，曾被派赴苏联购买客机；1952年10月调入军事工程学院，任技术部器材处副处长、102教授会副主任、主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1965年调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总工程师；1965年他毅然奔赴“三线”，到设在四川江油山沟里的航空喷气发动机研究所（624所）任首任技术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师。624所是聂荣臻元帅批示成立的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基地，现名为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董教授在该所主持设计建造了多项高台试验台及地面试验设备。1968年9月4日被迫害逝世。

#### ◇ 骗局

我们是1962年考入大学的，董霭鲁考入东北农学院农机系。1966年6月，全国大学都停课搞文化大革命了，到1968年上半年，虽然黑龙江省已成立了称为“东北新曙光”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派性争斗仍在继续，学校变成了战场，董霭鲁早已厌倦了这喧闹的校园，他决定回家，此时的家在遥远的四川江油624所，而他的父亲董绍庸已在北京国防科委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了。

董霭鲁于6月1日到达北京，找到了父亲，父子俩到天安门广场散步，父亲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问了董霭鲁和“对象”谈得怎么样了？父亲非常关心长子的终身大事；二是说科委领导留他在北京住着，是出于保护的目的，但他惦记着所里的技术工作，心里很矛盾。他说：“目前，624所数十项试验设备的设计已基本完成，正向外定货和加工，有的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建成后我们就有能力研究出不比苏、美差的军用飞机发动机。你回家后了解一下所里情况，看我回去是否安全。”第二天，董霭鲁就回四川了。

6月7日父亲从北京打电话回家，问妈妈赵继祥所里的运动情况，妈妈回答说正常。父亲说所里造反派来电话要他回来主持科研工作，他自己心里也正惦记着那些工作，所以决定明天就回来。6月8日下午，父亲乘飞机回来了。当晚12点，造反派来抄家，抄到一张1944年赴英学习航空的留学培训班结业时的合影，这张照片上共有20余人，董绍庸站在第二排，前排正中是陈立夫，他是来结业式上训话的，培训班学员全部由陈立夫介绍，集体加入国民党，为特别党员。造反派如获至宝，以此定董绍庸为特务。董教授此时才明白，造反派以所里技术工作为名，催他回来，原来是个骗局。第二天一早，父亲交给董霭鲁一只小皮箱，让董霭鲁拿着赶紧走，并交代说箱内有他的科研成果及重要技术资料，一封聂荣臻元帅写给他的信，还有6000多元的银行定期存单，这是父母多年的积蓄，在当时算是笔巨款了。父亲徒步十多里送董霭鲁到了江油车站，叮嘱一定要保护好箱子，钱你用来成家吧。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们父子的诀别。

#### ◇ 惊魂万里

董霭鲁带着小皮箱，到了重庆的一亲戚家（在红岩村山下），刚住了三天，624所造反派就来人了，董霭鲁携箱子从后门溜了出来，跑到红岩村山上躲了起来，晚上找了个山洞蹲了一宿。这一夜，蚊虫、鬼火他都不惧怕，怕的是有人上山来抓他。天亮后他回到亲戚家，亲戚说：“624所的人就是来抓你要皮箱子的，他们可能还要来，你赶紧走吧！”去哪里呢？去上海二姨家吧，连夜亲戚陪董去他单位办公室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从朝天门码头上船去上海。

在船上董霭鲁想，上海的二姨夫也被批成“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了，自身难保，624所的人肯定也会去追查，我要是去了，不但会被抓，还要连累他们。遂决定不去上海了，在武汉下了船，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两天，去哪儿呢？想起天津小姑姑，她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还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她家可能安全，于是就转乘火车去天津了。

到了天津小姑姑家，小姑紧张地说：“624所造反派来过了，我说你没来，他们还不信，警告我，来了马上报告，不得包庇！”真是走投无路啊！小姑姑说：“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我

是造反派，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董霭鲁当即决定，把小箱子留在小姑家，先住几天，听听风声再说。后来为了了解学校毕业生分配的信息，他写信同学。不久同学来信让董回去参加分配，学校没有任何关注董的信息，董认为可以放心回校了。于是他将其中的存款单随身带着，乘火车回哈尔滨学校了。

事后才知这又是一个骗局，骗董回来。在确定董霭鲁没带皮箱回校后，624所的人又跑到天津，抄走了皮箱。

董霭鲁回到学校，624所的人紧跟着就来了，他们通过东北农学院支左的军代表和工宣队，把董霭鲁扣起来了，关进了隔离室，严加审问有关董绍庸的情况，并抄走了存款单，并认定存单为董绍庸的特务经费，还抄走董霭鲁的集邮册，由于内中有大量解放前的蒋介石和孔子像的邮票，董被污为反动派的孝子玄孙。随后的一次针对学院领导的批斗会上，还将董霭鲁戴上高帽子陪斗，以施加压力，逼其交待问题。

九月初，董霭鲁接到母亲的来信，说父亲于9月4日被造反派迫害致死了。从董绍庸被从北京骗回624所到去世，还不到三个月。因为不是自由身，又背上必须与家庭划清线的包袱，董霭鲁不能回家尽孝，他躲到角落里痛哭了一场，还不敢让同学们知道这件事。此后，母亲再也未来信，原来她也被关起来了，关在一处农场。后来知道，母亲在关押期间，因为屡次上书中央要求调查董绍庸死因，还差点被炸死。那是某日在母亲打饭的必经之路上，有人埋了雷管和炸药，巧的是那天母亲反常没走那条路，幸免于难，结果炸死了一条狗。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年年底，毕业分配了，董霭鲁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发配到辽宁海城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水落石不出”

董绍庸去世时，造反派说是隔离审查期间畏罪自杀。母亲赵继祥去看遗体时，发现董教授头顶百会穴处有一根五寸长的铁钉，还有三个钉眼。人能够用钉子把自己钉死吗？真是天方夜谈！中国第一流的航空发动机专家、“两航起义”的功臣、哈军工的模范教授、共产党员董绍庸就这样惨死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年仅52岁。他带走了航空发动机赶超苏、美的宏图大志，也带走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深深的迷惑。

后来，624所虽为董绍庸平反了，但怎么死的？凶手是谁？一概没有交代。赵继祥拿着遗体头部的照片上访未果，哈军工的老同志们都对董教授的遇害感到痛惜和同情，刘居英老院长将申诉材料和照片交给了王震同志，王震看后气愤不已，说：“这个忙我帮定了。”他把材料和照片送到胡耀帮总书记处，胡总书记安排公安部赵苍壁部长负责复查，最终也没查出结果。事后，王震同志召见赵继祥，他对董教授的遇难表示哀悼和慰问，他说：“董教授不幸去世，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要滞后十年，可惜呀！”又说：“胡耀帮同志对此案一直关心，最后他感叹说‘水落石不出呀’。现在，我看自杀、他杀就不要再追了吧。”问题的难度在于，当年的造反派在落实政策、平凡冤案时还多在领导岗位上，不管在新官场上他们内部有多少矛盾，他们都要死守共同的秘密，也要官官相护。624所负责清查的人，如果有当年万里追缉董霭鲁专案人员一半的“敬业精神”，水落石出是不难的。

小皮箱倒是还回来了，但还回的是只破箱子，箱子的衬布、夹层全被撕开了，大概是怀疑夹层里藏了什么东西。箱内的科研成果资料和聂帅的信都没有了，有人说，董绍庸的科研成果到1980年代可能变成某些人的著作了，新权贵们在改革开放后又要为晋升职称、申报科研成果奖钓名勾誉了，624所1980年代所获科研成果奖多项都是董教授当初主持研究的。聂帅的信不见了，这是赵继祥、董霭鲁母子最痛心的损失。当年董霭鲁觉得这是父亲的信，自己不应该看，一路上都没看，这是董霭鲁最后悔的一件事。信上到底写了什么？现在还是个迷，

恐怕永远也解不开了。

#### ◇ 四十年的误会

1968年10月，全国67届大学生终于盼来了毕业分配，我和好友曹承佳回到住在哈军工“牛棚”的家里，我们想起了几年未见的好友董霭鲁，以后各奔东西再见面就不容易了，应该把我们的下落告诉他，以后好联系。于是，我和曹承佳就到东北农学院找到了董霭鲁，他把我俩带到校园一隅，我们三人坐在草地上聊开了。我和曹承佳都讲了各自家庭受冲击，被扫地出门的情况，我俩也问了董叔叔的情况，董霭鲁说：“我爸单位是部队保密单位，我爸是军人，没有事。”我和曹听了很是羡慕，那年头，军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是受人青睐的。我们还说，如果哈军工没有集体转业，还留在部队的话，也不会闹翻天了。谈话中，我和曹承佳都说了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话，我还说了几句对江青的微词，董霭鲁听后正色批评我们“思想有问题，不对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乱说话要倒霉的！”董还说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回来的路上，我和曹承佳都认为，董霭鲁的父母亲身在部队单位，是非常幸运的；董霭鲁现在还很“左”，他批评我们虽然是为我们好，怕我们犯事，但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骑马不知步行难呀！

此后四十年来，我思想上一直对董霭鲁有这个看法，直到这次校友聚会，他给我讲了他的那段遭遇，我才明白，我们41年前那次见面时，他的父亲已被迫害去世一个多月了，他是强忍着悲痛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来接待我们的，他还没有分配，不敢让学校的人知道他家的详细情况，他参加造反派组织是为了寻求保护伞。他那时没告诉我们父亲被害的消息是怕给我们火上浇油，他批评我们是怕我这个破嘴惹祸，多么好的老同学呀！

董霭鲁在1970年从解放军农场结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乐群公社农机站，举目无亲，单位没有食堂和宿舍，政治上又倍受歧视。直到“林彪事件”后，中央统战部来人到双城乐群公社农机站当面宣读了董绍庸的平反决定。董霭鲁要求把自己的不实结论从档案中删去，后来确实删去了，几年后董霭鲁才知道档案中有“此人应控制使用”的文字。好在他在浙江老家找了个好爱人，四年后靠爱人帮忙，调回了浙江。他在湖州南浔工作后，又调杭州师范学院附中任高中数学教师，后评上特级教师，2004年被评为市优秀先进教师。他当过三届杭州市政协委员（六、七、八届），第十一届西湖区人大代表，是民革浙江省委委员，并被评为第七届市政协“五好委员”。曾为杭州市环保、教育、公共服务、西湖和运河综合保护工程等方面积极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交的集体和个人提案不下百件，并曾两次在大会上代表“民革”党派作大会发言，社会影响很大。同时他的提案均被政府采纳，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在任政协委员期间还被任命为省民革“祖统委员会”委员、市民革“祖统委员会”副主任，为祖国统一和对台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兼任“市城管办”监督员和西湖区文化产业监督员工作，也做了许多有益民生的工作。

我们这次校友聚会时，曹承佳戏称他为“社会贤达”。我问董霭鲁：“当年你爸专案组的人，追缉你的人，有没有良心发现，向你母亲和你道歉的？”董霭鲁说：“没有。”我又在网上查了624所网站等有关董绍庸的条目，都没有提到董教授的冤案和逝世，难道这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吗？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2011年3月

~~~~~

【运动记愧】

我对批斗“反动军官”的悔恨

• 李 华 •

2010年8月下旬，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第10套播出的一个节目，里面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一支远征军，浴血奋战在印缅的热带丛林中的历史，使我了解到在这支部队里有无数为民族抗日大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其中就有我的一个乡亲熊俊昌。而这位英雄的大伯身经百战没有倒在抗日的战场上，却被我们这些忠于党和毛主席的红卫兵整死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真让今天的我悔恨不已。

我是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黄家屯村人。196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村的红卫兵组织在村小学召开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坏分子”熊俊昌。在我们的怒吼声中，他被押上了讲台，责令他交待所谓的“罪行”。可这一刻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平常言语不多的“反动军官”竟十分顽固。批斗会上他不但不诚恳地向我们低头认罪，而是用一个准军人的姿势站在台前。当我们让他交待他反人民的罪行时，他不是像有些被斗人员那么不堪一击，而是用军人的标准口语回答大家的逼问，并且回答得相当坦然和自信。当时他多次强调他是国民党党员不假，是个军官也不假，可说他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坚决不承认。他说他不但没罪，在抗战八年中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应该为他记功才是，让他交待他的反动历史，他就说他被派往印缅战场，在美军什么司令史迪威和国民党什么什么指挥下与日本侵略者殊死奋战，屡立战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顽固！顽固！让你这摆功来了”，台下多次这样大吼。为此他的顽固和摆功多次招来了我们这些有志青年的仇恨与气愤，我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军人真的会抗日，笑话！他的顽固与摆功只能招致我们拳打与脚踢。就这样，经过几次批斗，他就“服软”了，这个软服的很“真诚”，那就是一命呜呼了。到他死时连口薄皮棺材都没得到，是装在一个破柜子里下葬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火化。我们终于舒了口气，一个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彻底地被“革命”群众斗倒了。

说到这，我应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熊俊昌：他是1911年出生，由于家境贫寒，自幼就跟随父母逃荒讨饭，当小做活的。抗日战争爆发吃粮当了兵。在历次战争中作战勇敢，杀敌无数，从而他虽然是个大字不识的莽汉竟然混了个连副，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是行伍出身，当官也是靠和鬼子拼命拼出来的。”他说得确实是实话，因为在他从部队带回的那一堆奖章、勋章上就能肯定地证明这一点。熊俊昌比我父亲大几个月，按乡亲辈份我喊他“大爷”（也就是大伯）。由于我们居住得比较近，从我记事起对他的印象就很深。他为人和气，平常喜欢和我们这些小孩开玩笑。这时我们就不再喊他大爷而叫“大头鱼”，这样他也不恼火，仍然龇着两颗闪亮的大金牙冲着我们呵呵地笑。据说那两颗大金牙是因为作战时被敌炮炸掉后镶上的。我们都知道他胳膊受过伤，可当他夏天干活时或天热脱掉上衣，我们发现他的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疤。特别是他的右臂除了上段有一个大伤疤外，这只手握东西的姿势也很怪，大拇指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朝前而是朝后，看起来特别滑稽，其原因是这只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后手术时留下的残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我们村唯一穿黄呢子军衣的人。他是在淮海战役中投诚到解放军这边的。投诚后改编时被遣返回原籍。他唯一的胞弟熊俊龙收留了他。刚回村时他还带回一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南方小媳妇。可他们回村后生活没什么着落，种地吧连施用的猪羊粪都没有，只能向别家借。同时又因为他是“反动军官”，回村后就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小媳妇没多久就弃他而去了，从此土棚里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瞎胡混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命呜呼。过后当我懂些事以后才弄清，像熊俊昌这样的一个人好人太冤枉了。抗战八年，出生入死，由于其命大，没有倒在血腥的战场上，却留下个残废之身还成了专政的对象，最后惨死在了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中。

在动乱的1966年，我们这个仅千余人的小村，就有多达五六十人被打被斗被抄家，并且是一个挨批、株连全家，就连妻儿老小也会失去自由和尊严，自杀的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死有余辜，甚至死者亲属都不准哭泣。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除熊俊昌惨死以外，还有服毒自杀的、上吊自杀的，家人悲痛欲绝，不但得不到半点同情与安慰，领导还派我们去制止家属哭泣，并

在死者棺木上贴满标语来指责其死是自绝于人民，是人民的敌人。我们还有人性吗？

后来，我当上了农村支部书记，“文革”后逐步地认识到自己在“文革”中做了很多错事，用自己的特权剥夺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实在是惭愧和内疚。虽然以后多次以个人的名义向以前遭我迫害过的乡邻赔礼道歉，并且也取得了受害人及亲属的宽容与谅解，但有很多时候回忆起那年代的所作所为，总觉得寝食难安。特别是面对惨死的那些乡邻，我个人的赔礼道歉更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 2011 年第 5 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